

HISTORICAL STUDIES OF WOMEN AND GENDER

第三辑

妇女与性别史研究

主编 / 裔昭印 副主编 / 洪庆明



上海三联书店

妇女与性别史研究

主编 / 裔昭印 副主编 / 洪庆明

HISTORICAL STUDIES OF WOMEN AND GENDER

第三辑



上海三联书店



裔昭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古希腊罗马史、西方社会文化史和妇女史研究，现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等学术职务；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学术月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著译作6部，代表著作《古希腊的妇女》获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领衔撰写的《西方妇女史》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主讲的“世界文化史”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主讲的“西方文明史”被列为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史和欧美近现代文明史。近年来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历史学主流期刊和《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纸发表文章近二十篇，翻译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20世纪世界史》等多部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重大攻关项目子项目多项。

责任编辑：殷亚平
封面设计：汪要军 一本好書
604378042@rr.com



HISTORICAL STUDIES OF
WOMEN AND GENDER

《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编委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Françoise Thébaud Karen Offen 王 政 邓小南 朱易安 向 荣
刘文明 刘咏聪 刘津瑜 苏智良 杜芳琴 李志生 李剑鸣 陆伟芳
陆建平 陈 恒 陈 雁 武 寅 畅引婷 赵立行 侯建新 俞金尧
姜 进 洪庆明 晏绍祥 徐善伟 徐 蓝 高世瑜 郭小凌 黄 洋
康 凯 程 郁 熊 莹 裔昭印 薄洁萍

专题研究

《面饼和鱼》以及面饼和鱼

- 多萝西·戴为何不是女权主义者 彭小瑜 003

- 塞维鲁王朝的皇室女性形象 伊丽莎白·君特 021

- 古罗马女奴隶解放原因探析 李红霞 041

《拉凯斯篇》中“勇气”的博弈

- 一种男性气质视阈下的话语分析 杨 凡 050

- 男子气概视阈下的中世纪教士独身制 李 腾 071

- 伦敦郡议会里的女性参政合法性进程初探(1889—1907) 陆伟芳 085

- 国族妇女(1903—1945) 卢建荣 095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邮电部门的女话务员 马克·克罗利 106

师婆会、秃奶奶传说及民间女巫神化

- 以山西上党地区的田野调查、民间文献和口述为中心 姚春敏 119

明清世家女性垂帘观剧考

- 以山西高平良户村田氏家族为中心 王 姝 133

理论与综述

- 华夏族父权制研究的再审视与“内外有别”概念框架的新探索 杜芳琴 147

- 西方新妇女传记史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取径 陈茂华 170

被誉为女性史“教母”的美国学人格尔达·勒纳	郑爱敏	180
Contents and Abstracts		205
征稿启事		215

专题研究

《面饼和鱼》以及面饼和鱼

——多萝西·戴为何不是女权主义者

彭小瑜

摘要：人们一般认为多萝西·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而不是一位思想家。不过在研究戴的过程中，学者们其实可以由她的言论和行动中发现很丰富的素材，能够从里面总结出很多天主教社会思想的经典表述和实践案例。戴对现代西方女权主义模棱两可的态度透露出，她的关注重点并非是性别问题和性别之争，而是底层社会的弱小群体。她对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在社会问题上的傲慢与偏见有尖锐和深刻的批评。多萝西·戴的感情和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那些没有任何财富和影响力的、她每天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遇见的贫困弱小者身上，不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性。在这个意义上，她当然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关键词：多萝西·戴；女权主义；天主教社会思想；美国研究

我写过几篇关于多萝西·戴的文章，不过以前没有从妇女研究的角度去关注过这位 20 世纪美国著名的天主教徒。^① 教宗方济各 2015 年 9 月 24 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提到有四个人可以作为美国社会的道德楷模，即林肯总统、小马丁·路德·金、托马斯·默顿和多萝西·戴（1897—1980）。《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和希拉里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完全认同教宗表扬戴的话语，认为倡导社会正义和关爱底层民众的戴女士应该得到美国社会和政治家更多的关注。非常有意思的是，桑德斯还特地指出，教宗的演说并没有重点去讨论一些精英分子用来标榜他们的进步和时尚的性别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而是通过突出戴的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强调了社会公平的缺失和贫富分化的加剧，批评美国产生

① 彭小瑜：“一个激进者的皈依——多萝西·戴的思想与行动”，《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44—155 页；“改革者的理想与意识形态的困扰——多萝西·戴与约翰·科特的社会思想”，《北大史学》第 13 辑（2008 年），第 366—392 页。关于戴的经历及其活动背景，可以参考这两篇文章，以及彭小瑜所著《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中的有关章节。

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模式以及接受社会不平等的文化和态度。^①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结构通常是许多特定社会问题的根源,社会经济改革也往往是缓解和消除这些问题的前提条件。譬如我们对男女不平等问题思考和改良,一旦脱离对不公正社会经济和权力结构的批评,将问题的中心挪移到性别之争和种族问题,真正的社会改革焦点反而会被模糊化,贫困妇女沦落悲惨处境、少数族裔遭受歧视的真正原因反而会被遮蔽和掩盖。这就是为何致力于激进社会批评和改革的人士,诸如多萝西·戴和伯尼·桑德斯,通常不会将种族歧视和男女不平等这类问题看作他们工作的核心,而是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正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与之匹配的道德文化氛围。这样来看待社会问题的立场,展现在戴救助无家可归者的日常活动中,展现在她为社会正义不停写作和呼吁的文字和声音里。

这或许就是为何多萝西·戴不是女权主义者。由此思路,我在下面试图更多关照到多萝西·戴的女性身份,对她抗议社会不平等的思想和行动进行新的解读。

一、男女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西方现代女权主义者,包括基督宗教人士中间致力于女权的积极分子,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即她们对男女平等问题的极度重视会压倒对社会平等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怀,甚至会任由女权主义诉求变成中产阶级女性的特权,变成自私的抱怨和索取,譬如由女权主义立场进行的宗教研究就容易获得这样的特征。^②但是看重在历史上长期受压迫的妇女这一群体的权

① David Weigel, "The Pope Name-Dropped a Radical Catholic Activist, and Bernie Sanders Couldn't Be Happier," *The Washington Post*, 24 September 2015.

② Kenneth Aman, ed., *Border Regions of Faith: An Anthology of Religious and Social Change*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7), pp. 1-87. 编者在这里介绍了九篇具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宗教研究作品,其中多数体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妇女的权利和平等诉求。这个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不是多萝西·戴所认同的主张。June O'Connor, *The Moral Vision of Dorothy Day: A Feminist Perspective* (New York: Crossroad, 1991); "Stories from the South: The Voices of Latin American Women," *The Annu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13(1993), pp. 283-290; "Guiding Questions and Changing Directions: How My Mind Has and Has Not Changed",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5(1997), pp. 221-232. 奥康纳认为,多萝西·戴并不完全认同现代西方流行的女权主义观念,而是抗议所有人在不正义社会秩序中的遭遇,并以此来展现对贫困妇女的深切同情和爱护。奥康纳关注过拉丁美洲底层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极其悲惨的命运,注意到极度的物质贫穷甚至到了剥夺人们拥有精神生活的可能性的地步。她由这样的角度出发,强调戴对基督教道德的理解和实践不是去裁判人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去关爱物质和精神上被剥夺、被边缘化的底层人民,不是裁判、指责而是关爱,是设身处地、站到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人们的环境里面去关爱那里的男人和妇女。

益,是否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维护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尊严?^① 在社会压迫十分严重的语境中,男女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很难作为两个不同的问题来处理。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当拉美解放神学备受欢迎的时候,女权主义的立场也与之交融,而解放神学强烈的社会公正诉求也鼓舞了妇女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揭示了男女不平等与阶级不平等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② 这恰恰是多萝西·戴关爱贫困妇女的鲜明特征。

关爱贫困者的精神和道德必须由关怀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开始。而在富裕的美国社会,为何还存在难以解决的贫困问题呢? 戴早年曾经为美国社会党刊物采访和写作。她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批评,并没有因为她皈依天主教而改变。在 1963 年出版的《面饼和鱼》里面,戴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她笔端流露的情感与她在一战期间为社会主义宣传所写的文字并无不同。她讲述了很多贫穷妇女的故事,透露出她对垄断资本体制下贫富分化状况的感受。譬如《除了自己的身体,她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典当》。这篇文章里的安妮·米勒因为得了肺病的丈夫和两岁的儿子没有食物,不得不上街去当妓女,因此以拉客的罪名被送往感化院接受改造。戴在写安妮的遭遇时,关注的重点在她的丈夫和孩子: 杰米虚弱得都端不起汤碗,甚至早上那片面包对他都太沉重了。安妮想给他买个可口的橙子和能够抹在面包片上的新鲜奶油,想给儿子买点土豆做土豆泥,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典当,除了她自己的身体。她因此被送进了感化院! 由于戴所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最底层的男女以及他们的家庭,她并不特别强调中产阶级妇女在当时围绕女性选举权和计划生育来倡导的性别平等问题。譬如在 1916 年感恩节那一天,她采访和写到了一位因为重病吐血、卧床不起的丈夫: 他的妻子必须整天在餐馆厨房打杂挣得全家的生活费,12 岁的女儿在家照看着父亲和 3 岁的弟弟。交完房租和医药费,这家人几乎就没有钱买食物和取暖的煤炭了。^③

在这些为美国社会党报刊所写的文章里,妇女儿童福利始终是戴特别关心的问题,几乎所有文章的主角都是妇女。不过她也时刻让读者的眼睛看见在她们身边或者背后艰难谋生的或者在病痛中挣扎的丈夫和父亲。妇女平等的经济、政

① Leonard Swidler, "Jesus as a Feminist," in Kenneth Aman, *Border Regions of Faith*, pp. 30-38. 作者在这里特意指出,耶稣提倡男女平等和维护女性尊严,因为他肯定所有人的尊严和他们之间的平等。

② Alfred T. Hennelly, ed., *Liberation Theology: A Documentary History*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0), pp. 385-389, 514-520.

③ Dorothy Day, "Nothing to Pawn but Her Body", *New York Call*, 27 February 1917, p. 1.; "Dying Man Unable to Cut Turkey if the Family Had One", *ibid.*, 30 November 1916, p. 2. 这两篇文章以及戴发表在同一刊物的其他文章于 2018 年 3 月 1 日下载自 www.catholicworker.org。这些文章及其背景介绍,也见 Tom McDonough, *An Eye for Others: Dorothy Day Journalist 1916-1917* (Washington D. C.: Clemency Press, 2016)。

治和社会权利,在戴看来,不可能在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环境里实现。因此,她的文章总是把锋芒指向当时的垄断资本家,突显他们的奢侈生活与贫穷者艰难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譬如她呼吁约翰·洛克菲勒注意,人们正在用喂狗的食物充饥。她还提醒人们注意,富裕的阿斯特家族养育一个孩子一年的费用可以供养 7000 个贫民的孩子。^①戴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是否内心在考虑一个明确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呢?她这一时期的文章并没有讨论系统的社会改革,更不要说社会革命。在这数十篇文章里,戴透露出一个女性记者观察贫困者生活细节的敏锐,以及对女工人和劳工家属的体贴。戴对她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细节异常留心,譬如她谈到贫民在吃通常喂狗的鸡爪,用河边上捡来的漂流木头把鸡爪煮烂,做成味道尚可的肉冻。戴描写贫穷,但是在她的文章里,窘迫的穷人是尊严和讲究颜面的。她曾经描写失业工人家庭的主妇如何照看孩子。学校的老师注意到孩子营养不良的容貌,派护士来家访,让做母亲的每天给孩子吃牛奶、水果,在面包上涂抹奶油和果酱,烹饪营养丰富的肉汤。但是孩子的母亲能够做的,是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帮助孩子做好个人卫生。家里唯一的可靠收入来源是腾出来转手出租的一间房,因此他们通常能够吃得起的只能是咸鱼、面包和菜场里正上市的便宜水果。^②

在另一篇文章里,戴刻画了一位卧病不起、没有任何养老金的南北战争老兵。他太太靠自己饿肚子省下钱,买一点点牛奶和鸡蛋给进食困难的丈夫。戴还提及女工和女售货员工资低微,每天都不得不盘算花销,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而显赫的大银行家摩根的女儿居高临下地呼吁民众支持美国参加一次大战,声称那些每周有 15 美元收入的女工已经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她们却只看重物质享受,不懂得爱国是她们首先需要上心的事情。戴的文章用温和的语气揭示富人的虚伪。譬如她用平淡叙述的风格讽刺了纽约贵妇人举办的烹饪演示会:她们标榜自己的节俭,指责穷人经常浪费面包,并试图在活动中教会后者如何用过期的面包来制作开胃菜、浓汤、沙拉、主菜和甜食。当然,很多穷人并不领情,前来出席的人寥寥无几。这是否证实了富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即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勤俭和自立?^③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版本的“何不食肉糜”,与其说是愚蠢,不如说

① Dorothy Day, "Mr. J. D. Rockefeller, 26 Broadway: Here's a Family Living on Dog Food," *New York Call*, 13 November 1916, p. 1; "7000 Could Live on Sum Astor Baby Requires," *ibid.*, p. 7.

② Dorothy Day, "Mr. J. D. Rockefeller, 26 Broadway: Here's a Family Living on Dog Food," *New York Call*, 13 November 1916, p. 1; "East Side Home Is Cold and Dreary, because Machine Takes Tailor's Job", *ibid.*, 26 November 1916, p. 4.

③ Dorothy Day, "The Short and Simple Annals of the Poor Are Slow Starvation", *New York Call*, 16 November 1916, p. 1; "Girl on \$12 a Week Sneers at Anne Morgan's Idea of Ease and Comfort on \$15", *ibid.*, 4 March 1917, p. 1; "What! Bread Crumbs Go to Waste! Won't Poor Ever Learn?" *ibid.*, 17 February 1917, p. 1.

是伪善。

戴为美国社会党刊物所写的这些文章并不论及政策和立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观点。非常有意思的是,戴在这里提出的改良社会疾病的办法与她皈依罗马天主教之后系统执行的济贫措施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非暴力、不依赖国家干预、强调个人责任和敬重个人尊严的社会慈善。她描写了纽约圣公会妇女主持的一个救助屋:很多街头妓女以及酗酒和吸毒的潦倒女性在离开教养所以后在那里免费食宿,获得歇息和适应新生活的机会,有些人在找到正当工作之后继续在那里居住,交出自己薪金的一半,把另一半储存起来。与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不同,这一救助屋有几个特点,其一是不调查入住妇女的背景,不嫌弃她们的个性和脾气,也欢迎怀孕和带着小孩的妇女,不询问孩子们的来历,不责怪这些妇女的婚外关系。其二是用并非奢侈的体面物质生活待遇来体现对这些底层妇女的敬重和尊重。戴特别注意到救助屋内部的宽敞和亮堂,那里墙壁和地面上漂亮悦目的装饰,家具的优雅风格和细心摆放,以及住所外面的怡人景色。这是多萝西·戴一辈子,无论是在皈依天主教之前还是之后,试图在她的文字中展示的一个立场,即救助贫困的方式始终需要排除轻视穷人的一种特殊偏见,即社会只需要满足他们最基本甚至简陋的物质生活,他们对舒适、有尊严生活环境和条件的期望似乎是可以忽略的,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理需求似乎不需要精细体贴的关心。

戴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曾经尝试用5美元支付一周的生活开销,发现靠这种低薪工资生活的单身女性,尽管饿不死,但是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生活乐趣,也无法逃避狭小廉价出租公寓里的臭虫。救助贫穷妇女以及其他穷人,只是给他们提供这样一种生活吗?戴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标准。^①那么戴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也就是时刻把个人尊严和权益放在重要位置的正义社会秩序,如何才能实现呢?

多萝西·戴在1927年12月29日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在皈依之后,她并没有立刻停止与美国激进左派人士的交往,她在言论和文字中始终没有对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个人进行过任何攻击,始终尊重他们为推进社会正义付出的努力。美国共产党领袖伊丽莎白·格里·弗林(1890—1964)临终前甚至把自己的摇椅馈赠给戴作为纪念。^②皈依之后的戴逐渐意识到自己基于宗教信仰的世界观将导致她所选择的道路,与原来一起工作的社会主义者们所选择的道路不同。但是这一

① Dorothy Day, "Here's a Home in Which Girls May Bury Past Woes", *New York Call*, 15 February 1917, p. 1; "'Man Cannot Live by Bread Alone', Neither Can a Normal Woman", *ibid.*, 18 December 1917, p. 2.

② Jim Forest, *All Is Grace, A Biography of Dorothy Day*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2012), p. 31.

转变没有让戴放弃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和阶级不平等,而是让她转向天主教的社会思想,创办《天主教工作者》这份报纸,建立了服务无家可归者的济贫屋,以一种独特方式继续她原本对劳工群众的关心,继续追求她原本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寻找的平等和正义理想。在戴看来,漠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神父忽略了基督关于建立公正社会秩序的福音,而社会主义者在努力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时候没有看到基督是和劳工站在一起的。男女平等和女性的命运,始终是戴密切关注的问题,但是始终被她置放在基督宗教关于社会平等的语境之中来处理,而不是被处理成性别问题和性别之争。^①

二、旨在改变世界的“心灵的革命”

“每个初生婴儿都在胳膊下带着面包。”在《面饼和鱼》这部回忆天主教工作者济贫工作的著作里,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基于信仰的乐观生活态度:“困难会自然而然地被解决,苦难会凭借我们的信仰得到缓解。”这部书的书名取自《新约》四部福音书里面都提及的一个故事,即耶稣用五个面饼和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事迹。^②戴引用这个故事的用意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秩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贪婪、掠夺和战争,与基督宗教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需要人们积极努力去改变,不过改变的正确途径不是暴力、强制,更不是牺牲人们的自由和尊严,而是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是由每一个人自己开始,发起一场“心灵的革命”,通过每一个人自己的微小努力来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那么在与强大的财富、权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傲慢和盛气凌人抗争的过程中,弱小的个人又如何能够在卑微、失败和刻骨铭心的艰难困苦中,保持平和、拒绝暴力、坚守信心和耐心呢?戴的回答是,在这场持久的、必须不间断坚持下去的心灵革命中,参与者自己必须选择志愿的贫穷,与自己期望帮助的社会底层民众生活在一起,遭受贫穷生活的种种匮乏和不舒适:

当我们开始选取那最卑微的地位,开始为他人洗濯双足,开始渴望热爱自己身边的兄弟姐妹们,并用这种为他们受难的决心模仿走向十字架的耶稣,这时候我们才真正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了这场心灵的革命”。日复一日,我们坦然领受我们的挫败。我们能够如此,是因为我们对天主的胜利拥有信心。天主召唤了我们,就像他曾经召唤了那个幼小的孩子。那个孩子贡献出自己

① Dorothy Day, *The Long Loneliness: The Autobiography of Dorothy Day*, reprint edn.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1; first edn., 1952), pp. 149-166.

② 《马太福音》,参见《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仅有的几块面饼和几条鱼，试图以此去喂饱众人，而耶稣让面饼和鱼增加了无数倍，喂饱了五千人。

在戴看来，理想的济贫方式不是大规模的国家福利项目，而是在这场心灵革命改造了人和社会之后，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里接纳一个无家可归者，每一个基督徒个人做出的努力汇聚成整个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而此时的社会还会有任何人可能遭遇无家可归的命运吗？耶稣用面饼和鱼教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文化和生活方式。^①

戴在 30 岁的时候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是观察其一生为济贫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所做出的持续努力，她又何曾告别过自己青年时代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戴在自传以及其他带有自传性质的多部作品中都提及，她从 1933 年开始以自己独特方式进行天主教社会工作，是因为受到了彼得·莫兰的鼓动。莫兰的三大设想，即宣传社会公正的报纸、救助无家可归者的济贫屋以及众人共同所有共同劳作的农村公社，成为戴从此坚持不懈、为之终生奋斗的工作。这份报纸就是 1933 年 5 月 1 日首次出版并延续至今的《天主教工作者》，戴和莫兰发起的组织及其活动也因此被称为天主教工作者运动。其编辑部最初位于纽约市东 15 街 436 号，而第一家济贫屋就是戴的住所和编辑部的所在地，并逐渐为容纳更多流浪者而扩大到附近的其他几处公寓。后来为了更多空间，济贫屋两次搬迁，先在 1935 年搬到查尔斯街 144 号，后在 1936 年搬到莫特街 115 号一处有 36 个房间的公寓。1938 年 12 月，在写给纽约市卫生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戴说明了天主教工作者在莫特街过去两年的工作：每天为大约 1000—1500 人提供早餐。如果按照三年的时间来计算，戴和同伴们解决了大约 5 万人次无家可归者的住宿，供应了将近 110 万份早餐，13 万份以上的中餐和晚餐。^②

然而这些慈善劳作，拆分到每天都必须做的、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不仅不起眼，甚至也不美丽和耀眼。在有限的空间里，使用着简陋不完备的设施，天主教工作者济贫屋的生活环境并不光鲜，无家可归者经常需要睡在地板上，卫生间远远不够拥挤的人群使用，志愿者们繁忙疲劳之余还要和臭虫和跳蚤进行难以取胜的战斗。因此，莫兰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同情天主教工作者运动的神职人员和学者，譬如富

① Dorothy Day, *Loaves and Fishes*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7; first edn., 1963), p. 215; *The Long Loneliness*, pp. 185–187; *House of Hospitality* (Huntington, Indianan: Our Sunday Visitor Publishing, 2015; first edn., 1939), pp. 251–254.

② Dorothy Day, *The Long Loneliness*, pp. 182–190; Jim Forest, *All Is Grace, A Biography of Dorothy Day*, pp. 124–130. 戴关于莫兰的记载和回忆被集中收录在 Dorothy Day with Francis J. Sicusi, *Peter Maurin, Apostle to the World*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4)。

非神父,也往往转变方向,改而倚重国家主导、以立法为手段的社会改革。大家的目标都是追求社会正义,但是在莫兰看来,依靠国家和工会组织等渠道去关注贫困者命运,往往会导致冷漠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因为一个好官温暖和充满爱意的双手很难触摸到底层真实的人民。立法者和官员会住在首都华盛顿的以及各地的贫民窟吗?会与那里的人民真正深入地接触和交流吗?多萝西·戴与莫兰的信念在于,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个人努力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制度性慈善活动不可替代的,个人自发和脱离官僚管制的慈善事业带给贫困者的温馨和体贴,是财力强大的政府救济很难做到的。^①

多萝西·戴很清楚,她和莫兰发起和组织的济贫活动,在由政府和其他私立机构有组织的慈善工作面前,在规模、管理水准和硬件条件上不可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那么天主教工作者济贫屋的优越之处和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戴对此的认识可以分析到两个方面。

首先是官僚化、有组织和规则的福利制度对贫困者个人尊严难以避免的蔑视和伤害。戴描写过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纽约市政府的收容所:那是一个放置着1700张床铺的超级大厅,分成8排,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卧室”,但同时也可能是世上最让人心情黯淡的贫困窘迫景象。如果一家子人因为交不起房租被迫来到这里寻找住处,那么父母和孩子们会被强制分开,孩子会被送往贫儿救济院,而夫妻则分别被安置在男女隔离的集体宿舍。戴承认市政府在不断改善收容所的条件,让不得不在那里过夜和躲避风雪的民众有了坐下聊天的空间,有了淋浴间、理发室和洗衣房。她也注意到,即便是教会的慈善机构也未必会把无家可归者当作家人来对待,有些会有一定的收费要求,另一些可能会安排被收容者整日工作。而多萝西·戴主持的天主教工作者运动所建立和运作的济贫屋,对前来投靠的穷人没有苛刻的规矩和纪律约束,也不限制他们停留的时间,让他们自由来去。“我们没有制定什么规矩,我们的规矩就是普通家庭所要求的那些,我们不询问新来的人们任何问题。”^②

“我们抗议有组织规则的慈善事业,正是这些规则让无数人厌恶慈善这个原本美丽的字眼。”^③戴是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在《面饼和鱼》以及更早写作的《济贫屋》里面,在一连串小故事的叙述中,戴对弱者的体贴和同情、对资本主义贪婪的鄙视和愤怒,让读者难以躲避和漠视,逼迫读者在事实面前进行思考和做出选择。戴其

① Dorothy Day with Francis J. Sicius, *Peter Maurin, Apostle to the World*, pp. 121-122. 参见彭小瑜讨论富非神父思想的文章,“特惠穷人的取向——天主教社会思想历史考察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10页。

② Dorothy Day, *House of Hospitality*, pp. 68-71.

③ Dorothy Day, *House of Hospitality*, p. 255.